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

我的退思录

钱理群 著

在台湾讲鲁迅
漫说鲁迅左翼传统
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
文学、学术沉思录
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学
疯狂时代真的人的声音
读钱谷融先生

.....

新华出版社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

我的退思录



钱理群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 / 钱理群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011-9699-9

I. ①智… II. ①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0389号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

作 者：钱理群

选题策划：张琳琅

责任编辑：张琳琅

装帧设计：知行兆远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1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1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699-9

定 价：28.00

新华出版社发行中心地区经理：

郭俊明（浙）电话：63077121 张春普（粤、琼）电话：630774111

李永祥（豫、川、渝）电话：63077123 郭振银（京、沪、津）电话：630773866

张凤娥（苏、闽）电话：63073538 吴 萍（陕、甘、宁、青、新）电话：63077123

杨 彪（冀、鄂、皖）电话：63072198 马 烈（黑、吉、辽、内蒙古）电话：63072198

团购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目 录



【 辑 一 】 在台湾讲鲁迅 / 1

漫说“鲁迅左翼”传统 / 2

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 / 35

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 / 60

课后感言 / 73

语文教育座谈会追忆 / 79

【 辑 二 】 文学、学术沉思录 / 89

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学 / 90

疯狂时代真的人的声音 / 93

“咬住不放” / 96

“假如郭小川还活着……” / 99

读钱谷融先生 / 103

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 / 125

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 / 133

【辑三】直面教育 / 141

“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 / 142

王尚文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命运 / 149

《教育思想者》丛书总序 / 163

《底层教师的声音》丛书总序 / 165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 167

直面存在困境 /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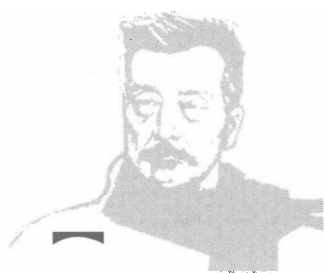
日常教学的琐细中隐含着深长的教育意义 / 179

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 / 185

让真正的教师成为教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 / 192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 200

让诗歌伴随一生 / 204



【辑一】

在台湾讲鲁迅



漫说“鲁迅左翼”传统

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与鲁迅重新见面”，组织者对此有一个说明：“因为鲁迅浓厚的左翼色彩，台湾在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变成了思想的禁忌。他的著作在解严前是禁书，因而阻绝了台湾学术思想界认识鲁迅，遑论持续研究。半个世纪后，如何在台湾恢复鲁迅该有的位置，打通中文世界共通的思想资源，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由此想起了鲁迅和左翼在大陆的命运。这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当上一世纪五十年代鲁迅和左翼在台湾成了禁区的时候，在大陆却几乎成为唯一的存在，以至一切右翼，甚至一切鲁迅批判过的人，都成为否定和打击的对象。在台湾这边不能讲鲁迅，拼命讲胡适，在大陆那边只能讲鲁迅，不能讲胡适，就形成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

但是后来到“文革”时期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因为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黑线”，认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是其老祖宗，于是左翼也不准讲了，鲁迅就更成为唯一者了。当时大陆上有一个说法，叫做“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金光大道》是“文革”中唯一被认可的具有激进倾向的小说，也就

是说，诺大的中国思想、文学界就只剩下一个人和一本书了。

鲁迅自己的命运在“文革”期间也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文革”开始的时候，鲁迅显然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把他曲解为“毛泽东的小兵”，跟着毛泽东造反。“文革”初期，年轻一代能够读到的书，除了毛泽东著作以外，就是鲁迅的著作。但也因为这样的机会，使得包括大陆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受到鲁迅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文革”后期，当大批青年来到农村，来到了鲁迅所描写的鲁镇、未庄，他们在农村看到了现实生活存在的阿Q、祥林嫂、闰土，就对鲁迅有了深切的理解，而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鲁迅观的影响。而且当人们对社会一切都绝望，要重新审视一切，怀疑、批判一切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成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批判性的精神资源。这样，正是在“文革”后期，鲁迅走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年轻一代人心中。

“文革”结束之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拨乱反正。三十年代左翼又逐渐恢复了正宗的地位。当时，知识界提出一个口号：“回到鲁迅那里去”，也就是回到五四、回到鲁迅的启蒙传统里。这样，在八十年代，鲁迅就成为大陆思想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

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大风波以后，当中国知识界掀起一股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潮时，历史的叙述又颠倒过来，左翼明显地被冷落，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红极一时，鲁迅最后十年的左倾，特别是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则不断受到置疑。以致今天还有人试图削弱鲁迅的影响，给鲁迅戴上三顶帽子：“集权统治的合谋者”，“否定传统的罪魁祸首”和“崇洋媚外”的“汉奸”。这一点也是颇为奇怪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又有了新的变化。随着整个大陆的改革发展进程，也出现了一些弊端，特别是一些普通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社会思潮开始左倾。于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自由主义与新左

派的论争。新左派以对于资本主义化的批判，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扩大了左翼的影响，在这方面，新左派是做出它的贡献的。于是三十年代左翼传统的研究、后期鲁迅的研究，又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到最近这几年，据我的观察，大体有三个因素，促成了大陆知识界左翼思潮的发展和复杂化。

首先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批判性的思潮。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来，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反思，关于建国六十年历史的反思，都带有很大的批判性，而批判者则出于不同的立场，有自由主义立场的批判、有保守主义的批判，另外一些是有左倾倾向的批判。

在全球化的背景底下，产生了跟全世界的左派的两重意义上的对话，一个是与西方左派的对话和相互影响，另一个是和第三世界的对话，这就包括了两岸三地和东亚、南亚地区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对话与相互影响。在这样一个对话当中，大陆就开始出现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年又出现一些试图超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可以有各种命名，有几种说法：“自由主义左派”、“左翼自由派”，还有一些是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我自己更愿意把他们称为“批判知识分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整个大陆的青年，包括大学生当中，开始出现左倾的倾向，我接触相当多的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发现他们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开始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非常深，但后来逐渐转向受左派的影响。我分析过其中的原因。本来，大学生，年轻人的本性，那种热情、正义感，本身就很容易左倾。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背景，就是这些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反映到大学里，这种

毕业即失业的危机，也促进了学生的左倾化。这样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大陆青年、大学生的左倾，可能会是下阶段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向。这就给“学院左派”，学院里的老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中，也包括研究机构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些新的空间。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

这样一种左倾倾向的复杂性，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出现左翼资源多元化的趋向。早期的左翼，特别是新左派时期的左翼，他们的主要资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仍然是青年主要的启蒙读物，但这些年逐渐提出了在西马之外，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关注的对象。另外一条思路，就是这些年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即对大陆民间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我觉得社会主义经验，不仅仅是国家的社会主义经验，同时有民间的社会主义经验，或许能从总结民间社会主义经验当中，吸取批判性的左翼理论的资源。

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包括台湾在内的左翼资源也引起关注，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目前，大陆这样一种关注大体上还停留在宣传、提倡的阶段，真正深入的、实质性的研究并不多。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马上要召开的陈映真的讨论会，抱着很大的希望。陈映真既受鲁迅影响，又受第三世界左翼经验的影响，他更有台湾自己的经验，这对大陆来认识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三世界左翼思想资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在吸取多元化的左翼资源的基础上，如何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第三世界的，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及批判性的理论，我觉得这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这就需要说到鲁迅。鲁迅从来就是左翼青年主要的精神粮食、精神资源。在当下中国如此复杂的情况下面，鲁迅显示了他的独特性，他独特的价值，甚至独特的重要性。刚刚永祥先生也说到，我的鲁迅研究从来就是和鲁迅不断相

遇的过程，在我刚刚介绍的这样一个中国大陆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下面，我对鲁迅又有了新的审视。这些年我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

一个是“东亚鲁迅”，这是我在和韩国学者的对话当中，受到他们的影响、启发而提出的。我在考察二十世纪东亚思想发展的时候，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就是东亚各国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面对共同的或相似的问题时，会有一些共同或相似的思考，即所谓平行性的思考。因此就和鲁迅不约而同地提出某些具有内在联系的、内通性的思想。东亚各国这些二十世纪的內通性思想是很丰富的，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弱，韩国相对做得好一些，韩国的学者就作了关于鲁迅与韩龙云、金洙映等等韩国思想家、文学家的比较研究，用韩国学者的说法，他们用自己独立的创造，与鲁迅成为相互照映的镜子，他们的文本和鲁迅的文本是可以做互文解读的。

另外一些东亚的思想家、文学家，或者不同程度受鲁迅影响，比如陈映真，但是有自己独立的创造。还有一些鲁迅的研究者，他们面对自己时代和民族的问题，阐释鲁迅又接着鲁迅往下讲，他们也同样地丰富和发展了鲁迅的文学与思想，这些年讨论得比较热闹的竹内好，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他创造了从鲁迅出发的竹内好思想。

针对这两种现象，我提出了“东亚鲁迅”的概念，就是某种程度上将鲁迅符号化，讲鲁迅遗产，就是讲鲁迅与他同时期东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共同创造，他们是二十世纪东方文化遗产、经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用“东亚鲁迅”来概括同时期这一批东亚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这样，鲁迅研究就必须更加注重他的东亚性、东方性，研究鲁迅思想所积淀的东方经验。鲁迅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我看来，至少在东方世界是有普适性的。这样一些东方经验和精神，是我今天下面要演讲的一个重点。

我要提出的第二个概念，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中心，即“鲁迅左翼”。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概念？因为我面对当下中国左翼的复杂性时，我就感

到鲁迅这样的与政党政治、国家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下面，就把我的有关思考向各位作一个报告和交流，希望听取诸位的意见。

以上算是我的引言、开场白。

我想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鲁迅左翼”。

首先，我试图做一个区分，把三十年代的左翼传统区分为两条脉络。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是“党的左翼”。

这个区分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最早在2006年的《鲁迅研究月刊》第2期，发表了《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指出在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中，鲁迅的文学与左翼文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深刻的分歧。我下面的想法基本上是他这篇文章的影响与启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发挥。

三十年代的“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之间，有非常复杂的缠绕关系，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是我们首先要肯定和强调的。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以致形成一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阵营。鲁迅有一个概括，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在和革命的劳苦大众同战斗、同命运这一基本点上，“鲁迅左翼”与“党的左翼”之间是有着深刻认同的。鲁迅一直把左联的共产党人视为“战友”，并不是偶然的。

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运动，同时是国际左翼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重要背景，是世界经济危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经济萧条，唯独社会主义的苏联经济建设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就导致全球性的知识分子

的左倾化，同情苏联，向往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普遍倾向。当时就有“红色三十年代”之称。鲁迅的左倾也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就鲁迅而言，他参加国际性的左翼运动是有自己的内在逻辑的。他曾专门写过文章，说他早就从俄罗斯文学那里知道，世界是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来划分的。他原来就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现在就更加自觉的认同左翼运动的国际性。这突出表现在他和东亚国家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遇害之后，鲁迅在悼念文章中，很明确地说“日本和中国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国际性的运动，何况他们和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还有组织上的联系。尽管有不同背景，但对左翼运动国际性的认同，也是鲁迅和共产党联合发动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

但“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是不能忽视的。

王得后先生的文章对他们之间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这里就不再重复。本来，通过使自己成为执政党来实现政治理想、执政理念，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就在于，当掌握和巩固权力成为目的以后，就可能发生革命党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蜕变，理想、信念和权力的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必然将权力也即既得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就跟鲁迅这样的一直以实现理想、信念为根本目的与追求的知识分子发生分歧。

三十年代中后期，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改变策略，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学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并不反对，但是有点担心，如果过分地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会不会掩盖或者美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会不会因此损害工农民众的基本利益？他有这样的担心，就提出另外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大众文学”，强调战争的革命性，要维护大众的利益，也就是要坚持他的左翼立场。

本来“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大众文学”，在我们今天

看起来是可以并存，互为补充的，至少是可以讨论的，但当时却不允许，认为提出了一个口号，就必须服从，而不允许另提口号，否则就是破坏统一战线。鲁迅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于是就发生了激烈论争。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郭沫若的态度，开始他对“国防文学”口号也有所保留，但是当党派人告诉他这个口号是党提出来的，郭沫若立刻改变态度，说：我服从党的决议，我要做党的喇叭。鲁迅与郭沫若的不同态度，标示了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

对这一点，鲁迅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这涉及鲁迅对政党政治到底怎么看。

这里有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许广平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激进青年，所以在1927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曾经有加入国民党的想法，她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就对她说，一个政党是要靠组织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信念的，所以政党是要强调纪律性的，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政党的决议，有的时候就要牺牲个人的意志。因此你要求入党，就必须想清楚，你是否愿意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个人意志，如果愿意就加入，如果不愿意，要始终保持个人意志和独立性，就别加入。这大体代表了鲁迅对政党政治的基本看法。

而且对自己这样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作家，和革命政党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鲁迅是有清晰的认识的。他在1927年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中说，当反对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时，左翼文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之间，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当革命胜利，革命政治家掌握政权以后，这时候他就希望维持现状。

在讲清楚“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的既合作又矛盾、冲突的纠缠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鲁迅左翼传统”的特点。我想把它归结为

四个方面，而每一个方面，都内含了许多矛盾，极具思想的张力。

刚才说到《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鲁迅又写了一篇《关于知识阶级》。我在这里慎重地向各位推荐，要了解“鲁迅左翼传统”，必须读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在《关于知识阶级》里，鲁迅提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这个真的知识阶级大概就是他心目中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为之下了两个定义。

我们先谈第一个定义。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并因此永远处在边缘位置。这里说得很清楚：处在体制边缘或体制外的位置，因此保持了党派外、体制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这大概就是真的知识阶级，也即我们说的“鲁迅左翼”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本质性的特点。

我们要强调的是，正是这样的党派外、体制外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决定了“鲁迅左翼”的彻底的，全面的批判性。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这样的彻底的、永远的、全面的批判立场，其立足点是什么？背后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想是什么？

这就需要谈到鲁迅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他在早年就提出来的“立人”思想。

提出“立人”思想的文章《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写于二十世纪初，差不多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立人”理想，是要回答当时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要建立怎么样的一个“近世文明”？这个“近世文明”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现代文明”，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现代化”。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现代文明观，实际上就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想象。鲁迅力排众议，提出尖锐的质疑：请问那些自称志士仁人的先生们，你们要把富裕当做文明吗？要把兴建铁路、开发矿业当做文明吗？要把议会政治当文明吗？他说，这都只是“现象之末”，只抓住了现代文明的皮毛，而不是

“根底”。我们看，恐怕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把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局限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发展与议会民主制度上，但鲁迅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质疑。那么，他认为现代文明、现代化的“根底”是什么呢？他的回答十分明确，就是“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而立人的根本在“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就是说，“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才是现代文明之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他说，即使有物质富裕了，科学技术发达了，也有了议会民主，如果没有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甚至以牺牲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代价，那么，我们绝不能说，中国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搞不好还会是南辕北辙，走岔路了。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有乌托邦性质的，是鲁迅彼岸的终极性的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是一个深刻的批判性的概念。如果用陈映真的话来说，它所面对的是人的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批判的是这样一种奴役状态。也就是说，立人思想的正面意义是强调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它的反题则是要批判对于人的一切物质、精神的奴役，要批判人压迫人、奴役人的制度和文化的。

正像鲁迅的老朋友，日本的增田涉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鲁迅对人的奴隶状态有一种高度的敏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作家最重要的精神素质，因为在他们看来，导致这样的人的奴役状态的关系，是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社会的，来自各种方面，并且会不断地再生产，因此是永远存在于此岸世界的。作为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用彼岸的乌托邦的终极性的立人理想，来照亮此岸的黑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以各种形态，特别是以最新形态出现的奴役力量与体制，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揭露，不断地向社会提出警示。因为这样的奴役关系会不断再生产，这样的批判就必然是彻底的、永无休止的。这就是鲁迅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要做永远的批判者，这一命题的真实的、丰富的含义。